



◀ 源/甘肃 ▶

正宁“三清”:景清、赵邦清、巩熾

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永靖

正宁,地处陇东黄土高原腹地,秦直道穿境而过,中原文化与边塞文化在此交融共生,特殊的地理区位造就了此地民众既崇文重教又刚毅坚韧的精神品格。明代以来,这片土地相继走出了景清、赵邦清、巩熾三位彪炳史册的清官廉吏——景清以忠烈殉节名垂青史,

赵邦清以清廉自守流芳后世,巩熾以节义坚守彪炳千秋。三人虽生卒年代有别、人生轨迹各异,却在精神层面形成了高度契合的价值追求,他们的事迹经官方修史表彰、民间口耳相传,逐渐从个体人生叙事升华为群体精神符号。

该符号的核心生命力,不在于零散

的事迹堆砌,而在于其蕴含的精神内核——它既是三位清官(下文简称“三清”)个人品格的集中体现,也是儒家思想滋养下古代知识分子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理想的具象化表达,更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与气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三清”生平

景清(?—1402年),原籍陕西长武,自幼父母双亡,寄养在真宁县(今正宁县旧称)辛庄里寨子村外祖母家中,入真宁籍。洪武二十七年榜眼及第,历任监察御史、御史大夫等职。其一生最鲜明的标签是“忠烈”,这份忠烈是对正义、对故主、对信念的坚守。

赵邦清(1558—1622),万历二十年进

士,历任滕县知县、吏部稽勋司郎中,他一生以“清廉”为底色诠释为官之道。

巩熾(1593—1661年),崇祯四年进士,历任林县知县、安阳知县,河南分巡道等职,被推为河南“三廉公”之首,其一生在政权更迭中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与人格底线。

三位清官的生平虽各有侧重——景清重“忠烈”,赵邦清重“清廉”,巩熾重“节义”,但在精神层面却共享着一致的价值追求:对清廉底线的坚守、对百姓福祉的关切、对强权压迫的反抗、对信念理想的执着。这份一致的价值追求,本质上是儒家“民为本、廉为基、义为先”思想的具象

化践行——三人皆出身科举,自幼浸润圣贤典籍,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不仅是学识追求,更是一生践行的行动纲领。景清以直言敢谏守护朝堂正义,以身殉道捍卫信念底线;赵邦清以清廉执政改善民生,以坚守原则对抗官场腐败;巩熾以勤政爱民践行初心,以乱世守节维护

民族大义。他们用不同的人生轨迹,诠释了“清廉是为官之本、民本是执政之魂、气节是立身之根”的共同真理,也让“三清”之名不仅是三个独立的清官符号,更凝聚成一个兼具统一性与独特性的精神群体,成为明代廉政文化与士大夫气节文化的鲜活缩影。

“三清”故事

(一)清廉自守

“清廉”是“三清”最鲜明的共同标识。在传统社会,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,其是否清廉直接关系到百姓福祉与社会稳定,因此“清廉”被视为为官从政的第一准则。“三清”之所以能彪炳史册,核心就在于他们将“清廉”内化为生命信仰,无论身处何种境遇,始终坚守底线、不越雷池。

赵邦清的清廉,是“一尘不染”的极致体现。任滕县知县时,他“布衣素食,蔬食自奉”,将俸禄多用于赈济灾民、兴修水利;罢官返乡后,他躬耕陇亩,“家无余财,室无长物”,家人靠翻新旧官服御寒,宁肯借债为母治病却坚决不向权贵求助。这种清廉并非刻意标榜,而是深入骨髓的生活习惯与价值选择——他拒绝的不仅是金钱贿赂,更是对权力异化的抵制;坚守的不仅是个人清白,更是为政者的职业伦理。正如《国榷》所载,赵邦清“治行第一”的评价,本质上是对其清廉为政的最高认可。

巩熾的清廉,体现在“惠民为先,克己奉公”的为政实践中。任安阳知县时,他捐俸筑城、训练乡勇,平定盗患却不向百姓摊派费用;面对饥荒,他将自己的俸银全部捐出赈济灾民,自己却“囊无余资”。即便在乱世中任职大顺政权,他也始终坚守清廉底线,未因政权更迭而改变操守——当看到义军内讧、纲纪败坏时,他毅然离职返乡,

(二)勤政爱民

如果说清廉是“三清”的为政底线,那么勤政爱民则是其为官的核心价值立场。在传统儒家思想中,“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”的理念深入人心,“为民服务”是官员的根本职责。“三清”的一生,始终将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,以实际行动践行“以民为本”的价值追求。

赵邦清的勤政爱民,体现在“务实有为,造福一方”的治政实践中。任滕县知县时,他面对“土瘠民贫,盗贼横行”的烂摊子,没有消极懈怠,而是大刀阔斧开展治理:兴修水利,解决灌溉难题,让荒田变成良田;鼓励拓荒,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流民返乡,增加粮食产量;开办矿业、设立钱庄,盘活地方经济;振兴文教,创办学校,亲自授课,

让寒门子弟有机会科举入仕。短短五年,滕县从一个贫困县邑变成“百姓安居乐业,市井繁荣有序”的模范县,安南使臣路过时不禁赞叹“此地吏治清明,百姓安乐,实为天下楷模”。这种政绩是靠勤政实干换来的——他日夜操劳,废寝忘食,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民办事中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的真谛。

巩熾的勤政爱民,彰显于“乱世之中守民生”的责任担当。任林县知县时,当地盗贼猖獗,百姓深受其害,他亲自勘察地形,设关隘、布兵防,彻底肃清盗患;面对“三饷加派”的苛税,他不惧朝廷压力,毅然废除,让百姓得以喘息;他深知“教化兴则民风淳”,亲自为学子授课,当年便有学子登科,开启了当地文教振兴的序幕。调任安阳知县后,他延续勤政作风:严惩权贵子弟恶行,维护社会公平;捐俸筑城,保障百姓安全;轻徭薄赋,扶持农桑;大开科试,振兴文教。

景清的勤政爱民,虽更多体现在其刚正执法、维护正义的行为中,却同样彰显了“以民为本”的价值立场。作为监察御史,他巡视地方时,“察民情、纠吏治”,严厉打击贪官污吏,为百姓伸张正义;任北平参议时,他“安抚百姓,整顿秩序”,尽力维护民生稳定。

(三)坚守气节

“三清”之所以能名垂青史,关键就

在于他们面对强权压迫、利益诱惑时,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与坚定的立场。如果说清廉是根基、爱民是核心,那么坚守气节就是“三清”的灵魂所在。气节,是个人在面对生死、利益、强权等重大抉择时的价值坚守,是人格尊严与信念追求的最高体现。“三清”身处不同的历史变局,面临着不同的生死考验,但都以生命践行了对气节的坚守。

景清的气节,是“忠烈殉道”的悲壮坚守。“靖难之役”后,建文帝旧臣或死或降,朝堂之上一片趋炎附势之声。景清明知自己势单力薄,却毅然选择以卵击石——他表面归顺,暗中一直伺机为故主复仇,谋刺事败后,景清被施以酷刑。他始终没有一句求饶,没有一丝退缩。他以生命为代价,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信念底线,诠释了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千古绝唱。

赵邦清的气节,是“不畏权贵,坚守原则”的生动写照。升任吏部稽勋司郎中后,他执掌官员考核、奖惩之权,成为“管官之官”,面对各种利益诱惑与权力施压,他始终坚守原则:原兵部尚书张学颜之子张承祚“跑官要官”,他顶住吏部尚书李戴的催促,坚决驳回;文选司郎中邓光祚等收受贿赂、篡改考核档案,他不畏其权势,大胆弹劾,严惩贪赃吏员;刑部官员王理以千两白银行贿,想谋求晋升,他不仅严词拒绝,还将行贿白银抬至御殿面奏,使王理遭重罚。这些行为最终招致构陷,

贬官,但他始终没有低头——即便罢官返乡,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,他依然坚守立场,不与之同流合污。这种气节,是对官场潜规则的公然反抗,是对权力公正性的坚决维护,彰显了古代知识分子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”的人格尊严。他失去了官职,却赢得了比官职更宝贵的清名;他生活清贫,却在精神上无比富足。他的气节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,也赢得了历史的公正评价。

巩熾的气节,是“乱世守节”的清醒坚守。巩熾的一生,历经清军入关等重大历史变局,面临着多重选择,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气节底线。清军入关后,清廷多次派人劝降,许以高官厚禄,他坚决拒绝,隐居于陕西三水县官家洞,潜心治学,坚守气节。最终,清军包围官家洞,放火焚烧,巩熾宁死不降,被焚死于洞中。他的气节,是对大义的坚守,是对人格的维护——在乱世中,他没有随波逐流,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,坚守自己的信念与立场,用生命践行了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节义之道。

“三清”的精神内核,是儒家思想滋养下古代知识分子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理想的具象化表达,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与气节文化的集中体现。它之所以能够历经数百年传承不衰,关键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追求超越了时代与阶级的局限,与人类对正义、公平、气节、尊严的永恒追求高度契合。



正宁调查——秦直道上的重要关口(资料图)